



『岩波新書』・日本近現代史④

大正民主運動

成田龍一◎著 李鈴◎譯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出版說明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複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〇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所關切並抱有相當興趣的。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日本岩波書店近年（二〇〇六—二〇一〇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式陸續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聘請了一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文，推介給各位讀者。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用

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出接近史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都出到了十版以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叢書的作者都試圖秉持學者的立場，但其對許多歷史場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與中國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為本體，與我們的立場必然有差異，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原作者的觀點，而是為我們了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近現代史的認識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素材。

這套叢書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對正文未做任何刪節。原有的插圖和大事年表，一概保留；原文中專門詞語的表述，一般均予以直譯（必要時譯者也會給予適當的解釋）；對原文中出現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譯者會以腳註的形式進行適當的註釋；對原著中的參考文獻，中文翻譯後再列出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讀者可查閱原文文獻；原著中的索引，考慮到對中文讀者的意義不大，略去不用。

目錄

序——在帝國與民主主義之間	11
---------------	----

第1章 民主主義和都市民眾	19
---------------	----

一、日比谷燒打事件和雜業階層	21
----------------	----

二、老闖們的居民運動	31
------------	----

三、第一次護憲運動和大正政變	39
----------------	----

四、民主主義的主張	49
-----------	----

五、「新女性」的登場	60
------------	----

第2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社會的變化	69
-------------------	----

一、合併韓國	71
--------	----

二、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	81
三、城市社會和農村社會	89
四、出兵西伯利亞的始末	100

第3章 米騷動、政黨政治、改造的運動……………111

一、一九一八年的米騷動	113
-------------	-----

二、政黨內閣的誕生	121
-----------	-----

三、「改造」的諸潮流	134
------------	-----

四、無產運動和國粹運動	146
-------------	-----

五、反歧視意識的萌芽	154
------------	-----

第4章 殖民地的景象……………167

一、投向殖民地的目光	169
------------	-----

二、三・一運動和五・四運動	179
---------------	-----

三、殖民地統治論的範圍	190
-------------	-----

四、華盛頓體系 199

第5章 現代主義的社會空間 207

一、關東大地震 209

二、「主婦」與「職業婦女」 217

三、「常民」是誰？ 225

四、城市空間的文化體驗 231

五、普通選舉法與治安維持法 239

第6章 經濟危機下的現有政黨和無產勢力 251

一、歷史的分段 253

二、現有政黨和無產政黨 261

三、財政緊縮、干犯統帥權、經濟危機 274

四、經濟危機下的社會運動 283

後記
298

參考文獻	300
大事年表	307

序——在帝國與民主主義之間

兩個吉野

政治學家吉野作造可謂「大正民主」的象徵。他有兩張照片，都攝於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前後，他四十歲左右的時候。一張照片中，吉野穿著輕便和服和孩子們在玩要。另外一張照片中，他領著家人和僕人，一副大家長模樣統率著全家。這兩張照片的落差——一張的態度是尊重身為家庭一員的「個人」，另一張擺出身為大家長的「公家人」的嚴厲面孔，兩者極不統一——表明，大正民主時代必不簡單。追求政黨政治、貫徹自由主義的是吉野，以長谷川如是閑不是學者為由而拒絕其加入黎明會的，也是吉野。另外，對中國的五·四運動抱有「極大共鳴」的是吉野，「坦白直言」對學生的行動方式抱有「一種反感」的，也是吉野。兩個吉野之間，表現了後人在評價大正民主時的猶豫。

吉野作造生於一八七八年（明治十一年），是宮城縣古川的一位棉線商的長子。從第二高中畢業之後，他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學習政治學。二高時代，他接觸到基督教，成為了教徒。吉野結婚很早，大學畢業後，他曾在中國（天津）擔任



包含僕人在內的吉野一家，共 11 人。（一九一七年左右，吉野作造紀念館藏）



吉野作造和孩子們。（一九二〇年夏天左右，出處同左）

袁世凱兒子的家庭教師，時間不長。他於一九〇九年二月開始在東京帝大講授政治史，翌年四月起留學歐洲和美國，歷時三年。

回國後，一九一四年一月，吉野投稿給《中央公論》。自那以後，他在《中央公論》上幾乎每期都有文章。他講解民本主義（後來，多用「德謨克拉西」），批判藩閥政治，主張普選，並積極與人論戰。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賽會議^①、米騷動、

① 中國大陸一般稱它為「巴黎和會」。本書的腳註都是譯者註。同一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中日雙方的命名經常不一樣。即使在日本學界內部，也常會因為學者或學派的觀點不一樣，對同一事件或現象的說法就會有不同。譯者在翻譯時尊重原作者對史實的提法，會用加註的方式標註出中國大陸的慣用提法。

原敬內閣的誕生、「滿州事變」^①等大事件，他當然會做出評論，每次都提出不可或缺的意见。不僅如此，他還積極參與實踐活動，建立了黎明會、新人會這種主張民主主義的團體。一九二四年二月，吉野從東京帝大辭職，加入朝日新聞社，擔任編輯顧問兼評論員。

吉野就這樣成為了日本二十世紀初期卓越的啟蒙家。他思考和行動的基礎，是「民眾」的存在。

兩個轉折點

吉野在《回顧鼓吹民主主義的時代》（《社會科學》，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文中，這樣寫道：「日俄戰爭一方面讓國民陶醉於帝國主義的海外發展，另一方面又促進國民自覺，幫助提升民智，從而帶動了民主思想的進一步發展。這一點已為眾人所知。」

吉野在此文中以他自己的著名論文《論憲政本意及其貫徹之途徑》（《中央公論》，一九一六年一月）為中心，「回顧」彼時「鼓吹民主主義的時代」，認為日俄戰爭具有劃時代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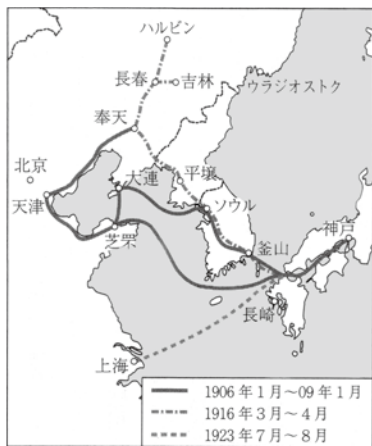
① 中國大陸稱「九·一八事變」。另外，本書中，除了個別的專有名詞或書名（如報紙名《滿洲日日新聞》、書名《滿洲的日本人》）之外，原作者一般使用「滿州」而不是「滿洲」。

人們開始認識到，明治維新以來推行的近代化，在日清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中得以完成。與此同時，人們還得到這樣的印象，日俄戰爭後，擔任國家和社會中層砥柱的那一代人，很快被代替，第二代人（新一代）登上舞台。不管是在當時，還是在歷史中，人們都認為日俄戰爭具有劃時代意義，這個劃時代包括「民眾」的登台。

不過，吉野還繼續寫道，「從那時起到今天，這六、七年，是一個在思想和運動的發展上急速飛躍的時代」。他同時指出，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八年期間變化巨大。在時間上，吉野把日俄戰爭前後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視為兩個劃時代的時期，他指出，當時，帝國主義式的膨脹和民主共存。吉野對同時代的認識有多敏銳，從這些發言中可見一斑。

與東亞民 眾一道

「我和一個個朝鮮人親切會面並聆聽其言論後，很意外的發現，現在仍對日本的統治有諸多不滿的朝鮮人，為數不少。姑且不管他們的那些不滿意見是否正確，我們不能把這些意見當作耳邊風」（《觀察滿韓》，《中央公論》，一九一六年六月）。這是吉野在一九一六年三月至四月到朝鮮和中國旅行的基礎上寫成的。加上這次旅行，他一共三次踏上朝鮮和中國（請參照地



吉野所走過的東亞。(根據田澤晴子《吉野作造》編製)

圖)。吉野作造關注的「民眾」，有日本民眾，同時也包括東亞民眾。

考察同時代的日本時，日本殖民地朝鮮、台灣、(南)樺太^①的民眾，受到以日本為首的各國侵略的中國的民眾，這些民眾的動向不可或缺。吉野和金雨英、金榮洙一起，召開了與朝鮮人的懇談會(一九一七年一月五日。從第二次會

議開始，叫做「參話會」)，與獨立運動的骨幹接觸。另外，在寫《支那革命小史》時，他不但從殷汝耕、戴天仇等革命活動家那裡獲取信息，還與孫文、黃興等人會面。中國留學生被捕事件(一九一八年五月)發生時，吉野要求救援和保護中國留學生。一九一九年三·一運動(朝鮮)和五·四運動(中國)發生時，他在論文中表達了共鳴。

① 中國大陸常稱它為庫頁島，俄羅斯叫它薩哈林島。

但是，正如吉野曾被人嘲諷性地叫作「吉野民主作」^①一樣，左派社會主義者和右派國粹主義者都批判吉野。歷史上，有一段時期人們對他持否定的態度，評價說他的帝國主義批判太溫和了。對於吉野和民主主義，甚至還有評論者說，這兩者都是帝國主義式的論調。事情也許同時關乎對吉野的評價和對大正民主的評價。

帝國與大正民主

本書作為「日本近現代史」第四卷，筆者要在此書中講述約四分之一世紀的內容——從日俄戰爭後一九〇五年左右開始到一九三一年九月「滿州事變」發生的前夜結束。吉野作造既敏銳地觀察著這個時代，自身也作為其中一員參與設計它。人們通常稱這個時期為「大正民主」，把它視為一個實現了政黨政治、社會運動向前發展的時期。現行的高中教科書說明這個時代時，用的就是這個提法。

不過，我們仔細考察就會發現，不同的論者在使用「大正民主」一詞時，在時期、內容、所指對象，甚至是歷史評價方面，有著不同的用法。現實情況是，

^① 這個綽號是把吉野作造的名字「作造」改稱為「民主作」。

「大正民主」不管作為歷史用語還是作為歷史概念，我們都很難說它已被明確確定。隨著指標所用地方變化，這個詞也會呈現出不同內涵。但是，人們達成一種共識——「日本」的歷史在這段時期產生了劃時代劇變，呈現出新的時代面貌。

本書也基於這種認識，以日俄戰爭後到「滿州事變」時的時空為對象進行敘述。大日本帝國的發展和帝國中的社會運動、以及大眾社會的前進，貫穿了這四分之一世紀。本書嘗試著描繪出帝國範圍內的社會狀態。在考慮到二十世紀民主與帝國主義——國家主義——殖民地主義——現代主義的關聯的情況下，嘗試探索出二十世紀初民主的歷史性格。

（補記）引用史料時，考慮到字數限制和易懂程度，有的地方會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同時，把一部分內容譯為現代日語。此外，引用文中（ ）內的說明都是筆者所加。^①

① 原作者在引用過程中，會在某些引用部分的旁邊用小字標出「（ママ）」，其意思是原文如此。這樣的標注主要針對兩種情況，一種是引用的原文中有錯別字，另一種是所引用的原文的用詞在當時或今天是有歧視意義。為了讓讀者正確理解意思，譯者把引用文中的錯別字按照正確的意思譯出。對於有歧視意義或者主觀感情色彩濃厚等性質的歷史詞彙，譯者保留原文表達。例如，「鮮人」一詞，在大正時期，不管是对朝鮮人抱著友好態度還是歧視態度的人，都在使用，但它可能包含主觀的感情色彩。但是，譯者翻譯時，省略了作者「原文如此」字樣的說明，但是尊重原文的感情色彩或歷史色彩等等。

第1章

民本主義和都市民衆



《火燒派出所的實況》。說明文字中，用英語寫著「The Great Disturbances in Tokyo」（東京大騷亂）。（《東京騷亂畫報》第六十六號，一九〇五年）



圖1-1 火燒內務大臣官邸的圖。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的傍晚到第二天，騷亂升級。（出處同前圖）

另一幅火燒內務大臣官邸的圖中，在亂石飛竄、濃煙滾滾中，我們能看見戴著巴拿馬帽和鴨舌帽的人（圖1-1）。兩幅圖都描繪了行動的人們。《東京騷亂畫報》把這些人叫做「群眾」，用實況圖加上照片的形式，描畫了他們火燒帝都的樣子。畫報的

「群眾」的衝擊

首先，讓我們翻開《東京騷亂畫報》（第六十六號，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它是在日俄戰爭中創刊的《戰時畫報》的「臨時增刊」。這份畫報B4大小，主編是國木田哲夫（獨步）。本期畫報卷首刊登了《燒打派出所的實況》的圖（請參考章首的圖）。這幅圖描繪了「群眾」拆掉派出所並付之一炬時氣勢高昂的樣子。圖中，最前面躺著巡查的鞋。行動的人們被畫成了日薪制工人，穿著工服，腳穿膠底短布襪，頭纏毛巾。

一、日比谷燒打事件和雜業階層

後半部分，是作家矢野龍溪寫的騷亂見聞錄——《騷亂記》。

畫報借用了原本在日俄戰爭時用圖像和文章來呈現戰況的手法，真實的描繪出了「群眾」參加暴動時的情景。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群眾」登場所帶來的震撼感。它還記錄下了人們進行破壞——動搖秩序——的情況。

騷亂之始

這份畫報所特刊的「東京騷亂」指的是所謂的日比谷燒打事件，事件發生於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到七日，其經過如下。日俄戰爭結束後，在美國的樸茨茅斯締結的合約中沒有賠償金一項。對此不滿的人們集結在東京日比谷公園，召開了國民大會。之後，他們火燒了附近的內務大臣官邸和主張贊成講和的國民新聞社。他們還與試圖阻止他們的警隊和軍隊發生了衝突。

九月五日，講和問題同志連合會^①（河野廣中、大竹貫一等人）計劃召開反對議和的國民大會。政府在事前就禁止他們開會，暫時拘留了連合會會員，封鎖了會場日比谷公園。但是，人群在當天一大早就開始聚集在日比谷公園，人數達到

① 譯者在翻譯各種團體的名字時，為方便讀者一步查找資料，在不是特別影響理解的情況下，譯者盡可能的保留原來團體名的日本漢字和語序。日語中的「連合」、「連和會」、「連盟」等，在漢語裡一般是「聯合」、「聯合會」、「聯盟」，譯者為了最大限度保留原來的團體名稱，還是沿用了日本漢字。

四千人。他們高喊著「開門，奸臣的爪牙（走狗）」，用圓木撞毀了封鎖的大門，爭前恐後地衝進公園，與試圖阻止他們的警隊發生了衝突。這時，警隊拔劍恐嚇人群，這使得人群更為「激昂」，他們開始投擲石塊。報道稱投擲的石塊數量有「數萬」，有的稱有「七、八萬」。

在這樣的混亂中，煙火盛放，寫著「十萬碧血可奈何」的氣球升上天空，大會在慌亂中召開了。包黑邊的悼旗被豎了起來，上書「悼議和達成」。臨時的講桌準備好之後，大竹發表了演講，河野朗讀了決議，宣佈合約不成立。然後，大家齊唱《君之代》，三呼「皇帝陛下」和海陸軍萬歲後閉會。

之後，大會主辦者從日比谷公園前往新富座演講會場，途中，有兩、三千人向二重橋行進。這群人讓樂隊演奏《君之代》，三呼萬歲。騎警阻止他們，於是，衝突發生了，人們投擲石塊。儘管警隊在新富座進行了強有力的警備，但是人們仍然堅持等候會議召開。京橋署長趕在講演者登場之前下令「解散」，命令人們退場，不聽命令的人被強行趕走。於是，這裡也投石亂飛，變成一場大混亂。

新富座的群眾與來自日比谷公園的人群匯合後，變成了幾千人的隊伍。他們蜂擁至國民新聞社，砸壞社牌，投擲石塊砸破玻璃，毀壞輪轉式印刷機和鉛字。人們又試圖前往首相官邸，為此，半夜之後，第一師團和近衛師團的三個中隊出

動，進行警戒。另一個數千人的隊伍包圍了日比谷公園正門前的內務大臣官邸。他們砸壞正門，與拔劍的警隊發生了衝突。就這樣，「群眾」在日比谷公園周邊，與警隊、軍隊發生了衝突。

火燒與戒嚴令

傍晚時，騷亂進一步激化。人群衝出日本橋大街——此大街從銀座通往萬世橋，開始火燒沿路的警署、警亭、派出所。在京橋警署轄區內，千餘人的「放火隊」兵分三路前進。京橋警署藉助軍隊之力得以保全，但是轄區內的京橋警察分署和其他十五個派出所都被火燒了，還有兩個派出所被砸壞。日本橋警署的玻璃也被砸壞，轄區內二十六個派出所被燒。除此之外，神田、本鄉、下谷警署轄區內的工商業區均遭受嚴重破壞，到五日午夜，共計兩間警署、六間警察分署被燒，被破壞的警亭和派出所達二百零三個。

六日時，騷亂仍在繼續。是夜，人群阻止市營電車前行，趕走了乘客和乘務員，在日比谷交叉點燒掉十一輛電車，在四谷見附燒掉四輛電車。另外，他們不但攻擊了火燒後的警署，還進攻了淺草、本所、下谷的基督教會（十三個）以及神田的東正教會大聖堂。

六日晚上，政府發佈戒嚴令，七號在市內設置了七十三個檢查處。然而，騷

亂仍在持續，人們聚集在內務大臣官邸周圍，還有人群湧向日本橋警察署等兩個地方。警察固守在國民新聞社前。但是，關於「火燒」的流言不斷，市營電車也在下午六點停運。然後，騷亂最終還是在這天停息了。

「雜業階層」

這次的騷亂可謂大規模，死亡十七人，傷者無數，被逮捕和起訴的人有三百一十一人。不過，它不具計劃性和組織性。

從被起訴者的具體身份來看（表1-1），此次騷亂的參與者很多都是「工人」、「商人」，以及在城市從事雜業的人，如「體力工人」、「車伕」、「手藝人」等。據說，在五日半夜襲擊赤羽橋際派出所的那些人，實際上「有五、六個流氓頭子，外衣脫到腰上露出肉色襯衣，高舉棍棒。眾人以他們為首，各自手拿棍棒，高聲齊呼後開始襲擊」（《萬朝報》，九月七日）。參加者們的階層接近城市下層，他們直接受到日俄戰爭影響。政府對煙草和白

表 1-1 東京騷亂的被告·被起訴者的職業構成(%)

	手藝人	零售商	知識分子與學生	店員	工人	體力工人車伕	其他及不明身份的人
日比谷燒打事件(1905年)	12.7	10.1	5.6	12.7	9.5	17.3	32.1
大正政變(1913年)	7.8	8.5	19.6	20.9	12.4	6.5	24.3
東京米騷動(1918年)	18.9	5.9	6.7	11.1	20.7	11.1	25.6

出處：我妻榮等編《日本政治審判史錄》，石塚裕道、成田龍一《東京都的一百年》

糖等徵稅，這種由大眾承擔的稅收壓迫著他們的生活。而且，隨著產業化的發展，他們的生計越來越不穩定。地面電車出現（一九〇三年）後，人力車逐漸失去了顧客。

他們這些城市「雜業階層」在生計上受工匠頭目、中小商店主、中小工廠主等「老闆們」僱傭。而且，他們住在商店，或是住在老闆們經營的出租房裡。他們從生計和居住這兩方面依附於老闆們。老闆們面向大街而居，而他們的空間則在老闆住所後面的小巷裡。騷亂如火如荼時，他們衝過的大街既是他們熟悉的空間，也是讓他們有壓抑感的空間——被火燒掉的警察署和派出所平時就在旁邊。

「老闆們」

但是，聚集在日比谷公園的人群中還有其他階層。據《萬朝報》（九月六日）報道，聚集在日比谷公園準備聽新富座演講的人大多「來自地方」，很多人年齡在「四十歲以上的不惑之年」，衣著整潔，留著鬍子，或者是「軍人遺屬」。通常認為，參加公園內集會的人來自「幾乎所有的階級和職業」，年紀和性別各異，但「都犧牲了父兄、愛子」，他們對「元老、內閣大臣有著深深的憤慨，抱著滿腔怒火」。雖然報道還稱有軍人和軍屬的身影，但那個

樣子其實是老闆們。

就這樣，與九月五日的事件相關的人士中有兩個階層。一個是「老闆們」，他們主導了講和問題同志連合會等反對議和的大會，聚集在此。另一個階層是積極參加騷亂的「雜業階層」。在此次事件前後，「老闆們」參與的不議和運動，不僅在東京、橫濱展開，還擴散到全國。大會在各地召開，先是在大阪、名古屋、京都、福岡等大都市，繼而在吳^①、栃木、富山、岐阜等地。各個大會的參加者都有數千人，針對議和的「反對決議」、「上奏」超過二百篇（《嗚呼，九月五日》，一九〇九年）。

新聞記者 和律師

這時，使兩個階層、使集會和騷亂兩個事態連接起來的是新聞記者和律師。在東京發行的《都新聞》、《二六新報》、《萬朝報》等報紙頻繁進行反對議和的宣傳。《東京朝日新聞》設立「關於議和事件的讀者來信」欄目，刊登讀者來稿，報紙介紹的很多意見都稱議和條約是「屈

① 指廣島縣吳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日本的海軍據點。本書後面的「吳海軍工廠」和「吳普選期成同盟會」等處的「吳」都是指這個地方。

辱的」。關於發生在日比谷的事件，他們報道集會的情況，還批判性的報道了騷亂中警官們拔劍等粗暴行為。為此，《萬朝報》受到停刊三日的處罰，《東京朝日新聞》則是十五天。

九月五日之後，大部分讀者來信都談到了火燒事件。《東京朝日新聞》的讀者來稿稱，「當局必須馬上明確其責任，以此向上下各方謝罪」，若不如此，「巷戰的修羅場」還會爆發（憂國生，九月七日）。

律師們則進一步控告警察。東京律師會關注警察的「虐待以及其他違法行為」，他們召開臨時大會，譴責「警察鎮壓手段之暴戾」（《日本律師協會錄事》，一九〇五年九月），並對受害者進行調查、採訪和記錄，以《流血遺滴》為題發表在《法律新聞》上（一九〇五年十月五日開始，共十九期）。為了批判動作遲鈍的檢察官，他們甚至於一九〇五年八月十日在本鄉座召開演講會，問責檢察長，有三千人到會。與此同時，他們還為「兇徒聚眾被告事件」辯護，負責代理河野、大谷等人和雜業階層這兩方。

他們的這種態度，在後來涉及到刑法修正時，統一變成了「擁護人權」。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們在神田錦輝館召開了「人權問題政談演講大會」，《日本律師協會錄事》還出版了「人權問題特集號」（一九一〇年一月）。

「國民」的 排外主義

然而，河野廣中認為集會和騷亂是兩回事。他稱，「與體力工人、車伕等一起謀國事這等輕率之舉，我絕對不會做」（《誦庭論草》第四，一九三〇年）。律師花井卓藏也認為雙方沒有聯絡。這兩個階層彼此背離，並沒有簡單的結合在一起。

不過，集會和騷亂的契機都是反對議和，其中都包含著排外主義。自由主義與國權主義、對藩閥的批判與擴大國權的思想，在河野的身上毫無矛盾的結合在一起。另一方面，雜業階層的行動，與他們之前對日俄戰爭勝利及將軍凱旋的讚賞，也毫無矛盾的統一在一起。他們衝過的地方，正是日清戰爭、日俄戰爭時，為慶祝勝利提燈、舉旗的行進空間，也是戰爭結束後迎接凱旋而歸的將軍時歡慶的地方。他們完全沒有想到過朝鮮、中國，或是俄羅斯的人們。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事情是在「國民」的名義下進行的。上面提到過的《東京朝日新聞》的「關於議和事件的讀者來信」裡，有人發現騷亂是「國民」對議和條約和締結條約的內閣的「憤怒」，並「感謝國民富有火熱的愛國心」（九月七日，署名「忠靈的墳墓」）。在「國民」的名義下，對藩閥和強權政治的批判，包含著擴張主義性質的國權要求，通過騷亂這種形式得以實現。不過，「國民」的基

礎極不穩固，它包含著矛盾和潛在的對立，兩個階層交織在一起，但各自提出了各自的「國民」概念。

在這之後，兩個階級的聯繫也仍在繼續。從二十世紀初到一九一八年夏的米騷動為止，城市中時常發生騷亂。城市空間中就像這樣充滿了動搖秩序的能量。這種變化是大正民主的導火索。

向著「帝國」的民主發展

作為同時代的觀察者，吉野作造認為，「民眾在政治上作為一種勢力行動起來，這將最終成為大趨勢」，而這次的變化「是這種趨勢的濫觴」（《論民眾的示威運動》，《中央公論》，一九一四年四月）。吉野在這裡用了「民眾」一詞，在他的理解裡，因為大日本帝國在日俄戰爭中獲勝了，「國民」作為批判的主體就登上了帝國舞台。二十世紀初的日本民主——批判政府和擔任批判的主體「國民」——與由「帝國」的結構所決定的國家主義結合在一起出現了，其背景是日俄戰爭的狂熱性。它是一種「帝國」的民主主義，它的對內態度和對外要求不是一樣的，它對政府的批判和對亞洲人的態度也不一致。

二、老闊們的居民運動

反對燃氣公司合併的運動

在一九一一年，即日比谷燒打事件後的第六年，圍繞著燃氣公司的合併，東京展開了大規模運動。東京的燃氣事業原本由東京燃氣壟斷。千代田燃氣創立之後（一九一〇年七月），開始搞降價競爭。為了改變局面，兩家公司制定了合併計劃。這個計劃需要東京市議會認可。但是，人們預見到兩家合併後會導致漲價，就開展了反對合併的運動。

以新聞記者、東京的區議員和市議員為主的人士，連日在報紙上公佈運動的動向、日程和決議等。東京各區議會發表反對燃氣公司合併的決議，從八月下旬到九月接連召開演講會，場場都「爆滿到無立錐之地」（《萬朝報》，一九一一年九月十七日）。人多的時候，一場有七百餘人參加。

區議會進一步聯合，成立了各區聯合會。他們發表決議稱，燃氣公司的合併有「壟斷」之弊，「欺騙東京市民」（《萬朝報》，九月十八日）。十二月一日是市議會審議合併案之日。當日，超過兩千人在錦輝館集會，召開反對燃氣公司合併的市民大會。會議的決議是，批准合併是「擾亂市公益，侮辱市民，更是蹂躪市自治權的專橫舉措」，據說會場「殺氣騰騰」（《日本》，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運動的核心力量是使用煤氣的中小工商業者，即「老闊們」。當時的煤氣專用於照明，日本橋的魚市，決定不用煤氣照明以示抗議（《萬朝報》，八月二十二日），神田區的旅館工會業者也表示反對合併（同前，九月二十四日）。

「老闊們」的運動

中小工商業者，即「老闊們」，在城市形成了相當有分量的「舊中間層」。他們僱傭當地人（構成騷亂主體的「雜業階層」），僱傭牙商、泥工、木工等上門的手藝人，僱傭上門服務的商人。在居住空間上，他們是租房給雜業階層的房東。他們有選舉權，選出市議員和區議員。這些有名望的人，構建了地區秩序。例如，在東京市，十五個區的區議員和市議員代表著他們的利益。

他們中經營時間長的店家，店面的土地從江戶時代就開始租用了，時間短的也有數十年了。店舖在多年信譽的基礎上建立了良好的人際關係。這些老字號在日本橋、京橋、神田、淺草等東京的中心地區從事工商業。

原本，老闊們展開的運動是圍繞著他們的生活基礎——土地租賃展開的。日俄戰爭後，地價暴漲，租金也漲價了，甚至於還有所謂的「地震交易」。「地震交易」這種行為是指，地主沒有徵得承租人的同意就把土地賣了，然後以此為由，



圖 1-2 「老闆」夫妻。(作者不詳，一九一三年)



圖 1-3 在鐵路車站運送乘客手提行李的「紅帽子」，和在坡下推貨車的「推車人」。兩類均是典型的「雜業階層」。(一九〇七年)

強迫承租人文還土地，因為「強地震」所以「地上所有的建築都震垮了」(《東京每日新聞》，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這種長期的城市土地關係發生轉變，針對這種情況，老闆們作為土地承租人，藉助律師的力量採取了行動。他們向議會提交《保護土地承租人權利的請願書》，於一九〇八年四月建立租地權保護協會，召開演講會主張承租人的權利，舉辦承租人大會，謀求立法保護租地權。老闆們從前面提過的一九一〇年夏的燃氣問題開始，圍繞著城市公益企業提出了一系列問題，並開展抗議運動。這些問題有：一九一三年八月的電燈問題，一九一六年二月的電車問題，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再次提出的燃氣問題。高木益太郎(議員、律師、《法律新聞》的主

編）是租地權保護協會的核心人物，他說老闆們是「日本帝國活動的軸心，這些中間階層的盛衰最終會影響到國力的強弱」（《法律新聞》，一九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廢除稅收運動

連維持地區秩序的人也成了運動者，大正民主就是這樣一場由地殼的基石所發起的運動。另一方面，比老闆們稍稍上層一些的工商業者們，圍繞著稅收開展了運動。商業會議所連合會（由五十五個商業會議所組成的全國性組織）從一九〇六年秋開始到第二年，發起了廢除稅收的運動，將日俄戰爭中開徵的鹽專賣、過路稅、紡織品消費稅稱為「三大惡稅」。參加商業會議所的資本家們雖然沒有特權，但是他們經營規模大，是舊中間層中的上層人士。他們以中野武營（東京商業會議所會長）為中心，與政界的革新相呼應，開展全國性運動。

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他們進一步成立了營業稅全面廢除同盟會。商業會議所連合會也在三十一日做出完全廢除營業稅的決議。營業稅以大範圍營業為對象，課稅基準不是收益，而是資本、員工數量等「外在基準」。這正是他們反對的原因。二月一日，他們在大阪召開了廢除惡稅演講大會（江口圭一《城市小資

產階級運動史研究》）。

居民運動的展開

除了東京之外，名古屋、京都、神戶等大都市，也圍繞著電車、燃氣、電氣等公益企業陸續發生了居民運動。地方上的中小城市情況也是如此。例如，在富山縣，因為富山電氣除了電費外還徵收器具損耗費，人們對此開展了抗議運動。他們六月六日在魚津町召開三町（魚津町、滑川町、東岩瀨町）連合大會。此外，他們還結成電燈問題連合會，「目的是敦促企業取消器具損耗費」。連合會通過《宣言書》後開始開展活動（《北陸政報》，一九一二年六月八日）。

農村的老闆們——有名望的人也開始行動。秋田的安藤和國說，「現行市政」是一種「官僚政治」，「背離了立憲思想、自治精神」，他主張電氣和燃氣改由市營（《秋田市政改善意見》，《第三帝國》，一九一三年十月十日）。

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者

日清戰爭後，勞工運動也在持續。在一九〇七年，吳海軍工廠、東京炮兵工廠、大阪炮兵工廠、三菱長崎造船所、足尾銅山、夕張煤礦等軍工廠、造船廠和煤礦的勞動爭議數量加起來就達六十件。對自己的工人身份有自覺認同的人們，在運動中也注意到城市結構和城市問題，於是，就和「雜業階層」和「老闆們」的運動有了聯繫點。民眾騷亂、

居民運動和勞工運動就這樣進一步展開，地區原有的結構和秩序開始動搖。動搖它們的正是中堅分子和與中堅分子聯繫在一起的人。

此時，連接他們的媒介是社會主義者。儘管社會主義者常常受到鎮壓，但是在給他們致命打擊的大逆事件發生之前，他們有自己的活動據點，與各地區也都建立了聯繫。日俄戰爭時，高唱反戰論的社會主義者，於一九〇六年一月組建了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日本社會黨，圍繞所提出的廣泛綱領進行活動。

一九〇六年三月，東京的市營電車準備提價。社會主義者西川光二郎和山口孤劍（義三）等人，與新聞記者田川大吉郎等人一起，領導了反對提價的運動，召開演講會和市民大會。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五日，市民大會在日比谷公園召開。它剛結束就發展為騷亂。西川、山口等人以兇徒聚眾罪^①被捕。

社會主義的網絡

與此同時，社會主義者們在日俄戰爭中就開始在各地進行宣傳，出售社會主義書籍，擔當「社會主義傳道行商」。全國各地都有了社會主義者。他們建立了社會主義網絡。他們以各地區為中心，建立

^① 根據網絡版的三省堂《大辭林》，「兇徒聚眾罪」這個罪名在舊刑法中稱為集團性暴力，是專為鎮壓自由民權運動所設。

社會主義團體，如：北海道的札幌平民俱樂部、下野同志會（栃木）、北總平民俱樂部（千葉）、橫濱曙會（神奈川）、岡山伊呂波俱樂部等。他們還出版《熊本評論》、《大阪評論》等以地區為單位的社會主義雜誌。和歌山的《牟婁新報》中有較多新聞跟社會主義有關，為其工作的荒畑寒村和管野須賀子^①是社會主義者。

另一方面，初期的社會主義運動不但有言論活動，還在各地嘗試著實踐活動。如，北海道的社會主義者原子基，一邊揭露「北海道移民的悲慘」（《日刊平民新聞》，一九〇七年），一邊經營平民農場，在當地根據自己的理念進行實踐活動（小池喜孝《平民社農場的人們》）。

另外，遠渡美國的片山潛和幸德秋水等人與當地的社會主義者交流，以三藩市為據點建立網絡。

但是，在一九〇七年二月的日本社會黨第二次大會上，圍繞著實現社會主義的方法，他們產生了對立。一派是幸德秋水^②等人的直接行動派，認為運動的重

① 管野須賀子（一八八一—一九一一），明治時代的記者，女性運動家，社會主義運動家。大逆事件中被判處死刑的人中，只有她是女性。

② 幸德秋水（一八七一—一九一一），社會主義者，《萬朝報》記者。他建立了平民社，發行《平民新聞》。後期成為無政府主義者，因大逆事件而被判死刑。

點應放在大罷工等直接行動上，另一派是片山潛^①等人的議會政策派，重視議會鬥爭。直接行動派認同（克魯泡特金的）「相互扶助」的思想，主張否定政治權力，靠近無政府主義。一九〇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的赤旗事件，就是這種動向的產物。當時，大杉榮等人揮動赤旗，後來被捕。

「國民」對藩閥的批判

發展成「帝國」的明治日本，沿用舊有的結構無法應對新情況，因而引發了很多運動。這些運動的總稱就是所謂的「大正民主」。大正民主運動是各個階層為對抗舊的社會結構和秩序所展開的運動。

與此同時，圍繞著民主的主體，出現了錯綜複雜的事態。具體說來就是，老闆們參加的集會和運動，也標榜「國民」（或者是「市民」、「民眾」），試圖強調身為批判主體的「國民」這一面。岐阜市的人們反對電費漲價結成「關燈聯盟」時，奔赴當地的茅原崙山^②，把這場運動視為「公司與自治人民的戰爭」（《岐阜市關燈聯盟演講》，《第三帝國》，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六日）。雜業階層的騷亂也不單純。然而，記者和律師們給它的定位卻是，它是以「國民」的名義進行的批判潮流。各

① 片山潛（一八五九—一九三三），勞動運動指導者，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先驅。日俄戰爭時，他曾反對戰爭。
② 茅原崙山（一八七〇—一九五二），跨越明治、大正和昭和三個時代的評論家，新聞記者。據說，他是第一個提出「民主主義」概念的人。

個階層（名稱各異，沒有統一，其中有「人民」、「民眾」等）開始談「國民」，甚至也被指名為「國民」。可以說，「國民」在形成時就是不健全的，或者說是它的形態是不完整的，但是它卻發展到旗幟鮮明的反對藩閥的地步。

三、第一次護憲運動和大正政變

明治的 結束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日，《官報》的號外發表了明治天皇的《聖體醫案》。次日的《東京朝日新聞》幾乎全部版面都在報導「聖上陛下病危」。它全面披露了以下信息：七月十四日開始生病，記錄下的體溫、脈象、心跳，有識之士的談話，人們的反應。此後，報紙連日大篇幅報道明治天皇的情況和人們的動向。報紙的標題傳遞著緊急情況，如：《病況不明》（七月二十三日）、《病情不妙》（七月二十五日）、《病情險惡》（七月二十七日），最後報道的是《危險時刻迫近》（七月二十九日）。

時任內務大臣的原敬^①常去探病。七月二十九日明治天皇逝世時，原敬在

^①原敬（一八五六—一九二一），政治家，他是立憲政友會的創始人之一，後來出任此會總裁。一九一八年，原敬組織內閣，是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平民首相。

日記裡寫道，「維新以來首次遇到這類事，要商議之事頗多」。同時，後面的日記說，天皇逝世的時間是二十九日晚上十點四十分，但是宮內決定對外說成是「三十日零點四十三分」。「估計是因為沒有時間舉行即位儀式」。之後，原敬也忙成一團，不是去弔唁就是窺察「聖意」。

七月三十日的各種報紙上都寫著「天皇駕崩」的字眼，刊登「悼詞」，整個報紙上登的都是跟天皇相關的事。天皇逝世後一小段時間內，報紙上都是黑框。一位畢業於兵庫縣布施村高等小學的少年，叫大西伍一，他當時一邊在家務農一邊準備升學考試。他在日記中寫道，「嗚呼，命運之神已帶走了我們敬畏的天皇。雖然是命運，但是也太過突然、短暫、無常。我們唯有無言含淚悲傷」（《自大少年日記》，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報紙還報道說，大葬期間，學校停課，人人服喪，暫停喜事。

乃木殉死

九月十三日，原陸軍大將乃木希典^①夫妻在天皇大葬當日殉死。報紙誇張的報道了情況，不少人受到衝擊。少年大西伍一也是其中一

① 乃木希典（一八四九—一九一二），陸軍大將。他出征日本國內的西南戰爭和中日之間的甲午中日戰爭。日俄戰爭時在中國的旅順作戰。後來成為學習院院長。明治天皇逝世時，乃木希典夫婦殉死，引發熱議。

個，他還寫了悼文。有人認為「大將之死驚醒昏睡的國民」（海老名彈正《論乃木大將之死》，《新人》，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夏目漱石藉《心》（一九一四年）中人物之口說，「明治精神始於天皇，終於天皇」，其中能窺見「殉死」之影。

大體狀況是，人們讚賞乃木的人品，但是對「殉死」感到困惑。以年青一代為中心，人們表現冷淡。例如，白樺派^①的青年就很冷淡，二十九歲青年志賀直哉在日記中寫道，「真是個蠢貨」。桐生悠悠批判了乃木，他的觀點是「自殺或是殉死，乃封建陋習」（《打破陋習論》，《信濃每日新聞》，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政治學者浮田和民向「日本國民」建議說，要把眼光投向「世界」（《論乃木大將的殉死》，《太陽》，一九二二年十一月）。

人們把天皇之死和隨之而來的乃木的殉死視為時代分界點。同時，他們還以此檢查自己身為「國民」的狀態。但是，有人針對「舊思想」提出了新思想，他們參考「世界輿論」，主張新的感覺和意識。

① 白樺派是日本近代文學流派之一，以雜誌《白樺》為主要陣地。他們提倡人道主義、理想主義和尊重個性，是與自然主義對抗的一種流派。白樺派在大正時期是文壇中心。

增設兩個師團的問題

在這個時期，跟「帝國」的政治和社會有關的根本性變化並未停止。

日俄戰爭前，桂太郎^①內閣和西園寺公望^②內閣「情投意合」，他們交替組閣，即所謂的「桂園內閣時代」。藩閥和政黨兩種勢力既妥協又對抗，交替掌握政權。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五日，第二次西園

寺內閣因為增設兩個師團的問題而倒閣。陸軍考慮到要入侵中國，要求在朝鮮增設兩個師團。西園寺內閣以財政為由拒絕了陸軍的要求。陸相上原勇作對此不滿，提出辭職。接替他的人選一直不能確定，因而導致內閣總辭職。陸海軍大臣需是現役軍人，因此，可以說西園寺內閣是被和他對立的陸軍倒閣的。原敬質問桂太郎道，「此次增設師團的問題真是莫名其妙。外面都已甚囂塵上，上原在內閣一個字也沒有向我們吐露」，「不曾預料到上面的事態，也就沒有解決之道」（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此事發生，乃因軍部作為政治勢力已有自己特有的力量。

① 桂太郎（一八四七—一九一三），陸軍大將，政治家，致力於用德國兵制建設日本陸軍，曾三次擔任日本首相。

② 西園寺公望（一八四九—一九四〇），政治家。他參與了幕末的「王政復古」，參加了戊辰戰爭。他擔任過日本政友會總裁，曾出任日本首相，後來還作為元老在日本政壇持續發揮影響力。

第一次護憲運動

內閣總辭職後，人們對上台的桂太郎內閣（十二月二十一日成立）意見很大。他們已經看清，強行要求增設兩個師團從而打倒西園寺內閣的是陸軍和長州藩閥。

早在十一月下旬，東京商業會議所就反對增設師團。在全國商業會議所的支持下，他們結成了增師反對實業團。十二月十九日，三千多人出席了在歌舞伎座召開的第一次擁護憲政大會，參加的人中還有尾崎行雄（政友會）、犬養毅^①（國民黨）。會議還沒開始，會場狀態就「已經是劍氣滿堂」了（《東京朝日新聞》，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十二月二十七日，憲政擁護連合會成立，其中心是一九一〇年成立的立憲國民黨，還包括政友會和商業會議所。憲政擁護連合會召開了演講會和大會，之後，勢頭越來越猛。

與政黨同步的是新聞記者等報刊業。他們喊出了「打破閥族，擁護憲政」的口號，對藩閥展開批判。《中央公論》出版了「擁護憲政、打破閥族的運動與政界的變動」（一九一三年二月）特集。反對桂太郎內閣的運動不僅在東京，還在大阪、名古屋等日本各地區展開。這次運動被稱為「第一次護憲運動」。

^① 犬養毅（一八五五—一九三三），政治家。一九二九年成為政友會總裁，一九三一年擔任日本首相。他在五·一五事件被暗殺，政黨內閣的時代因此暫告結束。

議會和 騷亂

桂內閣主導下的第三十次議會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召集，按照慣例很快休會，定於一月二十一日再次舉行。同時，桂太郎還在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日公佈了新黨（後來的立憲同志會）成立的消息。新黨是在桂太郎承認政黨必要性的基礎上成立的，於是，有人從國民黨轉到新黨。

在攻擊與防守中，一月二十一日的全體會議沒能開成，再休會十五日。二月五日再次開會時，桂太郎進行了施政方針的演說。然後，政友會的原田肇、尾崎行雄登台。尾崎提出彈劾內閣的緊急動議。此時，尾崎追究了桂太郎的非立憲態度——桂太郎利用詔書，利用天皇對他的挽留。尾崎行雄說：「他們平素張口就說忠愛，簡直把忠君愛國當做他們的獨家產品。但是，看看他們的所作所為，就會發現，他們常常幹的就是躲在天皇的背後狙擊政敵。」

但是，桂太郎先讓議會休會到二月九日，而他繼續利用天皇的挽留之意。對此，原敬寫道：「桂請聖旨，抑議會，打倒西園寺內閣，這在憲政上無法容忍的，黨員們激憤異常」（《日記》，一九一三年二月九日）。九日，有一萬多人參加了在兩國技館召開的第三次護憲會議。

二月十日，議會重開。一大早，人們就聚集在日比谷的議會周圍，迎接憲政擁護派的議員。這些議員胸佩白薔薇來到會場。《萬朝報》（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二日）稱

① 關原之戰是德川家康獲取天下的最關鍵的一場戰役。這裡借用「關原」，指到了關鍵時刻。



圖 1-4 群眾提出擁護憲政，聚集在眾議院門前。（一九一三年二月五日）

二月十日乃「政界的關原」^①，危機存亡之日」，它對這天情況的報道如下。議會附近和日比谷公園裡聚集著「一大群憂國之士」，人們齊聲對著國民黨議員大呼「萬歲！萬歲！」據說，他們一看到支持桂太郎的議員（「官僚派」），就將其從人

力車上拉下來，指戳、搖晃一番。因為騎警挺進，人群投石對抗。於是，國會議事堂附近出現「大喧嘩」的狀況，樣子「野蠻、粗暴，簡直跟日比谷事件一模一樣」。在此混亂中，桂太郎計劃再停會三日，消息傳開後，人們迎接佩戴白薔薇的議員。另一方面，騷亂再起。

聚集在議會周圍的人們，喊著「《都新聞》是官僚報紙」，湧向其在附近的報社。他們衝進報社，砸壞座椅、電話等，然後放火。他們又進一步襲擊國民新聞社、報知新聞社、大和新聞社、讀賣新聞社、二六新報社，砸破玻璃

窗，砸爛房內東西，不斷叫囂。而且，他們還推倒各處的警亭、電車等，投石砸壞，縱火焚燒。這次的大騷亂中，砸爛、燒毀的警亭有八十六個，燒毀的電車二十六輛，死傷者五十三人。

騷亂不僅發生在東京，大阪和神戶也一樣。東京受到起訴的人多是手藝人、店員、工人等，這也表明，騷亂的主體是「雜業階層」（表11）。另外，遭起訴的學生數量也不少。可以說，新的世代也開始登上歷史舞台。

大正政變

在議會停會的同時，桂太郎決意辭職。政友會幹部原敬寫道，「我想，他要是還不辭職的話，差不多要發生革命了」（《日記》，一九二三年二月十日）。就這樣，桂內閣於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一日總辭職。這就是所謂的「大正政變」。動搖根本的變革之力與政黨之力一起作用，最終推倒政權。

原敬總結寫了二月十三日到十九日的日記，他道，「最近數日太過繁忙，我甚至沒時間寫日記」，「大體上就是組織內閣的事，極其混雜」。第三次桂內閣是個短命內閣，五十三天就告終。桂太郎自己也很快過世。桂新黨在一九一三年年末變成立憲同志會。政友會的反對黨就這樣出現了。

薩摩派的海軍大將山本權兵衛^①接替桂內閣。政友會也採取合作態度。山本內閣不但整頓行政，還修改文官任用令，把陸海軍大臣需由現役武官擔任的制度要求放寬，削弱藩閥力量。原敬說，這是「緩和國內輿論的必要條件」（《日記》，一九一三年三月六日）。擴大自由任用文官的範圍，把陸相和海相的任用資格從現役大將、中將擴大到預備役和後備役的大將、中將。這就擴大了政黨行動，目的是突破藩閥勢力的壁壘。

西門子 事件

但是，尾崎行雄等二十四人不願「與閥族握手」，從政友會退黨，結成了政友俱樂部（後來的中正會）。另外，國民黨也拒絕與政友會合作。以尾崎、犬養毅為首的議員、實業家和新聞記者等一百五十人，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二日，成立了憲政擁護會，他們在「擁護憲政」的口號下展開批判活動。除此之外，憲政擁護會還從一九一四年一月開始了廢稅運動，要求廢除紡織品消費稅、營業稅和過路稅。在二月二日的臨時總會上，他們把山本內閣視為薩摩藩閥進行批判，「我們要秉承打破長州藩閥的精神，決心根除藩閥，肅清海軍」（《東京朝日新聞》，一九一四年二月三日）。

^① 山本權兵衛（一八五二—一九三三），海軍大將，政治家。他在第二次山縣有朋內閣擔任過海相，是薩摩藩的實權者之一，還曾兩次擔任首相。

山本內閣從一九一四年一開頭就遇到了意外事態。報紙報道，德國西門子公司和英國維克斯公司向日本海軍士官支付「回扣」。三井也牽涉其中，事情發展成大規模瀆職事件。稻田三郎（同志會）等人在預算委員會上追究此事，在野黨（同志會、國民黨、中正會）提出彈劾內閣決議案。

二月初開始，各種批判演講會和大會連日召開，還舉辦了肅清海軍演說大會。二月十日，在日比谷公園召開的彈劾內閣國民大會上，有數萬人聚集。當他們知道彈劾決議案被否決時，立即奔赴議會，在那裡和警隊發生衝突。而且，他們包圍了政友會總部和政友會派的中央報社，騷亂再次發生。在此情況下，山本內閣於三月下旬總辭職。

地方的根本性變化

這一連串運動的主體是老闊們（舊中間階層）。但是，有學者指出，地方上的護憲運動中，有「市民的政治結社」作為一種經常性組織存在。這個問題會在後面談到（第二章第三節）。時事性的問題影響到政局，它不僅在東京，還在更廣泛的社會中引發了變動。

一九一四年二月五日，富山市的富山新聞社主辦了「廢稅問題第一次縣民大會」，一千多人到場，以新聞記者為中心發表了演說。他們批判政府不管「減稅計

劃」，決心「廢除營業稅這等惡稅」，談及「西門子事件的曝光已經完全暴露了海軍的腐敗」。並且，他們還把三個項目變成了「決議文」，其中包括：與「國民」一起，「期待能保全」「國家威信」（《富山日報》，一九一四年二月六日）。他們不但邀請本地選出的議員本田恆之發表演講，還一致表示，「不投票」給不遵守「決議」的議員（同上）。

新的世代帶來了如此大的變動。所謂的大正民主也是一場與這個新世代聯動的運動。《中央公論》（一九一四年四月）出版了小特集「論以民眾勢力解決時局的趨勢」，得到了浮田和民、林毅陸、永井柳太郎、吉野作造的投稿。「國民」（「民眾」）的抬頭促進了根本性變化的發生，它不僅僅是政治問題，也是思想問題。

四、民本主義的主張

新詞：民本主義

經濟學家河上肇^①提到「最近常常聽到民本主義一詞」（《何為民本主義》，載《東方時論》）的時間是一九一七年十月。大正民主時，前半期的思想主調是「民本主義」。民本主義與「立憲」、「憲政」等詞一

^① 河上肇（一八七九—一九四六），經濟學家，京都大學教授，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和無產運動。代表作有《貧窮物語》、《資本論入門》等。

起，成為考察民主時所用的「新詞」。

據說，最早開始用這個詞的人是新聞記者茅原崑山，他後來主持雜誌《第三帝國》。但是，民本主義並沒有統一定義，實際情況是，各人有各人的用法，「有時，好像其內涵極為不同」（河上肇）。論說民本主義的人，以茅原為首，還有植原悅二郎、室伏高信等，人數不少。其代表性人物是迄今不時登場的吉野作造。

吉野作 造的民 本主義

吉野於一九一六年一月在《中央公論》上發表了《論憲政本意及其貫徹之途徑》。此論文以更加凝練的形式論述了吉野對民本主義的認識。儘管它只是一篇雜誌論文，卻是一篇長論文，頁數過百。這篇論文議論的中心是政治目的、方針的決定、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運用，論文大量介紹了以歐洲為中心的各國的歷史和現狀，從而展開了民本主義論。吉野把成熟「國民」的存在（「國民的教養」）視為前提，然後論述了「立憲政治」這種「用憲法來施行的政治」，他把民本主義視為立憲政治的根本。吉野在定義了民本主義之後，認為它是「以一般民眾的利益、幸福及其意向為重的施政方針」。

吉野把民本主義當做 democracy 的日語翻譯。當時，雖然有人把 democracy 譯作「民本主義」，卻因為這意味著「主權在民」，與君主國日本不相符而被拒絕使用。吉野說，民本主義談的不是主權的存在，而是一個主權運用的概念。在此基礎上，吉野認為，政治目的在於「一般人民的幸福」，政治決策要基於「人民的意向」。他所提倡的民本主義，其前提是天皇擁有「主權」，是「為民」的政治，是重視「人民意向」的政治。

從這個意義上，吉野批判了排斥「國民」的樞密院和貴族院，批判了藩閥和元老的存在，批判了立足於「超然主義」的內閣。他主張，要用「憲政」（民本主義）的理念改革那些封建專制的舊體制和舊勢力，同時實行自由主義改革，實現政黨政治，擴大選舉權，重視下議院（參議院）等。在與舊藩閥對抗的層面上，吉野認識到「封建時代多年養成的思想和陋習」仍「殘存」於制度中。吉野的民本主義很有現實性。

在表達上，吉野使用「國民」、「人民」、「民眾」，沒有固定到一個詞上。他把「國民」視為民主的單位，在制度的運用層面上把握民主。他認為，選舉時的一票關係「國家命運」，「投票是為國家」，所以要培養「國民」。他所主張的民主是，運營一個更好的國民國家。總之，我們可以說，所謂的民本主義

這樣一些討論，是以「國民」為原點，通過運用大日本帝國憲法改良政治和社會。

變化的 吉野

筆者在前文一直提到，日俄戰爭後「國民」（「民眾」）登場，這是民本主義的背景。實際上，吉野贊同日俄戰爭，這時他還有愚民觀。而且，筆者在後文會論述，吉野對侵略中國的對華二十一條要求，也是支持的。

但是，吉野在一九一六年同一年份的《中央公論》中，發表了《決定對支外交根本政策的日本政客頭腦混亂》（三月）和《視察滿韓》（六月）。前文支持中國革命，批判了日本的中國政策。後文批判了統治殖民地的憲兵政治。吉野注意到中國和朝鮮的民族主義，批判軍閥主導的對外強硬、壓制自由的政策。在這之後，吉野關於民本主義的議論，也根據各種狀況在進行修正。

針對藩閥，以及對內、對外層面中的舊制度和高壓型的舊思想，吉野提出批判，從中可以看出吉野的民本主義。這種民本主義的背後，有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的影響，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第二國際的活動這種世界性的動向。

關於天皇 機關說的 論戰

憲法學者上杉慎吉^①對吉野的民本主義所進行的批駁和否定，從側面證明了這一點。早在一九二二年，上杉就與憲法學者美濃部達吉^②展開了所謂的天皇機關說的論戰。美濃部主張的天皇機關說是「指，國家擁有在法律上的人格，國家作為法人，是主權的主體，天皇則是國家的最高機關，這一學說對憲法作了自由主義性質的解釋」（《憲法報告》）。上杉批判這種學說從理論上排斥天皇統治（《關於國體的異說》，《太陽》，一九二二年六月），與美濃部展開論戰。

上杉和美濃部都以大日本帝國憲法作為前提。但是，上杉把焦點放在「帝國國體」上，主張天皇主權。與此相反，美濃部則在統治權的運用方面探索立憲制道路。他們二人在對待藩閥政府和政黨政治的態度完全相反。上杉是吉野的主要論敵。植原悅二郎等其他民本主義者也對上杉提出了批判。

① 上杉慎吉（一八七八—一九二九），憲法學者，東京大學教授。他以「天皇主權說」的立場猛烈攻擊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指導了國家主義的社會運動。

② 美濃部達吉（一八七三—一九四八），憲法和行政法方面的學者，東京大學教授。他主張「天皇機關說」，與「天皇主權說」派展開論爭。

對吉野的 批判和民 本主義的 潮流

不過，吉野的民本主義也常被批判缺乏主權論。其他民本主義者對論文《憲政本義》也批判頗多。茅原華山說，「吉野博士根據場合在使用民主主義」（《洪水之後》，一九一六年二月一日）。室伏高信把「民主主義」視為「人民的統治」。他批判吉野議論不夠徹底，說吉野縮小了民主主義的意義（《論代議政治，問吉野博士》，《雄辯》，一九一六年三月）。

但是，吉野討論的重點，不是原則方面，而是在選舉權的擴大、包括言論自由在內的社會自由等方面。他提出了切實有效的提案。表面上看，他在妥協。其實，吉野要求改變制度，從「民權發展」的觀點批判了「舊時代遺物，即所謂的特權階級」，提取出「一般人民」這一政治上的主體，持續的進行討論。我們或許從這一點就能看出他的天分。

民本主義的潮流既多樣又廣泛。茅原華山主持的雜誌《第三帝國》，不僅有植原悅二郎、犬養毅、尾崎行雄等批判舊制度的人投稿，常在《中央公論》發文的田川大吉郎、據點在《東洋經濟新聞》的三浦鏡太郎^①有時也出面鼓吹民本主義。地方上的青年人投稿到《第三帝國》的讀者來稿欄目「青年的呼聲」。例

^① 三浦鏡太郎（一八七四—一九七二），從明治時期活躍到昭和時期的經濟評論家，是東洋經濟新報的主筆之一，主張小日本主義。（「鏡」是「鐵」的異體字）

如，福岡的上川利平要求普選，他主張要通過普選改變現狀。他說：「普選權乃最大利權，必須賦予他們〔工人〕普選權，把他們當成人。必須讓他們的血管也像我們一樣，裡面活躍著血球。」（《賦予工人吧》，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五日）可見，民本主義並不停留在中央的思想家中，它擴散到地方，尤其是年青一代積極參與籌劃。

另外，石橋湛山在《東洋經濟新報》上的文章，從謀求國家發展得更好的立場出發，批判了現狀。甚至在文學領域，聚集在《白樺》、《反響》上的青年們從各自的立場出發批判了壓抑性的體制。《白樺》創刊號（一九一〇年四月）聲稱將登載「在各自能容忍範圍內的、暢所欲言的文章」，宣告了要從舊思想中掙脫出來。

立憲主義和帝國主義

但是，對民本主義的議論尚未觸及到帝國的根源。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壁壘同帝國意識一道，成了明顯的攔路虎。

立憲主義築成了民本主義的基石。其出發點在於提出「對內立憲主義，對外帝國主義」。他們主張把民權論與國權論、自由主義與國

權主義結合起來，從兩方面維持「國家繁榮」（高田早苗《採取帝國主義的得失情況》，《太陽》，

一九〇二年六月）。浮田和民把「當下的帝國主義」與「過去的帝國主義」相區別，認為它有「頗多倫理要素」，它不是「軍事的」而是「國民的經濟要求」，浮田容許經濟的擴張主義（《帝國主義與教育》，一九〇一年）。浮田提倡以「國民」為主體的立憲主義和以此為基礎的變革。同時，他還重新定義帝國主義，認為它不是武力侵略，而是經濟的擴張。浮田肯定經濟帝國主義，認為它是有「倫理」的。

容許這種帝國主義的立憲主義和民本主義的觀點，難以抑制擴張主義。

三浦鑣太郎的小日本主義

三浦鑣太郎卻極其深入到這一點上，對擴張主義進行挑戰。他在《大日本主義乎？小日本主義乎？》（《東洋經濟新報》，一九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至六月十五日）和《放棄滿州乎？擴張軍備乎？》（同上，一九一三年一月五日
至三月十五日）中認為，「大日本主義」的立足點是「擴張領土和保護

政策」，而「小日本主義」則與此相反，是一種「改善內政，增進個人自由和活動力」的手段。

三浦舉出財政上的數字，指出「大日本主義」的「禍根」，控訴保有台灣、朝鮮、樺太和租借地關東州是「國民的大浪費」。他不但指出經濟上的負擔，還把「軍閥的跋扈」、「軍人政治的出現」、「對軍人謳歌的感情」視為大日本主義

的「禍害」，嚴厲批判了「大日本主義的大幻影」。三浦的批判是對「日本」現狀的擔憂。這種對「大日本主義」的批判，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好的國民國家。

針對三浦的議論，中野正剛的《大國式的大國民》（《日本以及日本人》，一九一三年十二月）進行了駁斥，「作為國家，則應建立大國；作為國民，則應成為大國民」。《東京經濟新報》從經濟合理主義的立場出發，主張「小日本主義」，對佔有殖民地表示懷疑，還反對擴張軍備。

以普通讀者為受眾的《太陽》、《中央公論》等，被人們的動向所左右，態度曖昧。此時，小雜誌《東洋經濟新報》明確擺出一副批判性的民本主義者的面孔，始終保持急進的民本主義。在這之後，《東洋經濟新報》也由石橋湛山等人提出了民本主義中最為急進的討論，如：提出擴大選舉權、進一步採用普選制，主張放棄殖民地。

大逆事件 和「寒冬 時代」

為了考察民本主義在歷史上的不同情況，有必要先談及它與進行言論批判的社會主義的關係。

一九一〇年之後，大逆事件中止了社會主義者們的公開活動，他們進入所謂的社會主義「寒冬時代」。大逆事件是這樣一個事件：

社會主義者宮下太吉製造了炸彈，同樣身份的內山愚童持有甘油炸藥，當局誣陷他們有「暗殺明治天皇」的嫌疑，然後開始一舉鎮壓社會主義者。別說是暗殺天皇，跟製造炸彈無關的其他社會主義者也一一被捕。幸德秋水、菅野菴等二十四人因大逆罪受到死刑判決，十二人在一九一一年一月被執行死刑。所謂的大逆事件是司法官僚平沼騏一郎等人製造的事件。社會主義運動因為此事件從此消聲匿跡，之前對社會主義有共鳴的人們受到衝擊，開始遠離社會主義。以前，社會主義者就被跟蹤，每個行動都受到監視，大逆事件後情況更加嚴峻。也有人像德富蘆花一樣大膽批判政府（《謀反論》）。然而，很多人都無法再進行公開活動。

幸存的社會主義者堺利彥^①經營賣文社（一九一〇年十二月設立），想方設法餬口，與此同時，他還出版滿是滑稽文章的機關雜誌《絲瓜花》（一九一四年一月）。另外，大杉榮、荒畑寒村等人出版《近代思想》（一九二二年十月），決心東山再起。同時，這也是維持社會主義者團結的一種嘗試。醫生加藤時次郎為社會主義者們提供資金，自己也有參與籌劃的經歷。他於一九一二年在東京新橋創立成本費診療所

① 堺利彥（一八七〇—一九三三），社會主義運動家，日本社會黨和日本共產黨的創立者之一。

代思想》則表達了對《白樺》的親近感。民本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之間並沒有切斷聯繫。

但是，正如我們前面看到的那樣，民本主義者很難做出社會主義者所展開的那種對帝國主義的批判。幸德秋水的《帝國主義》（一九〇一年）以「愛國心」、



圖 1-5 《東京朝日新聞》報道，大審院判決，幸德秋水等二十四人死刑，兩人有期徒刑。（一九一一年一月十九日）

（後來的平民醫院），以價格低廉的醫療救助「中等貧民」。

雖然程度各異，但整體狀況是，「現在，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突然受挫。於是，無奈之下，所有的社會主義者有必要暫時偽裝溫順」（堺利彥《大杉君和我》，《近代思想》，一九一三年十月）。

在這種狀況之下，一九一五年三月的大選中，當文學者馬場孤蝶提出「極力擴大選舉權」、「縮小軍備」，並被提名為候選人時，賣文社的安城貞雄主管選舉事務。社會主義者和民本主義者之間寬鬆的「共同戰線」得以實現（松尾尊兌《大正民主》）。另外，民本主義者出入賣文社，而《近

「軍國主義」為焦點批判「帝國主義」。對擴張主義和戰爭的批判，就是以此書為首，通過平民社的活動以及週刊《平民新聞》等機關誌，蓬勃發展起來。但那是以前，當社會主義因鎮壓而銷聲匿跡時，對帝國主義的批判也急速衰退。

對民本主義的歷史評價不穩定的原因是，他們主張對內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和國權主義結合，對外方面，容許擁有殖民地、擴張主義等，很難對帝國採取果斷的態度。從這點來看，我們可以說民本主義可謂是一國的民主。這也正是帝國民主的姿態。吉野作造，尤其是《東洋經濟新報》的眾人，在這之後，仍繼續討論一國民主，一直討論到它的臨界點。

五、「新女性」的登場

《青鞥》的女性們

「元始，女性其實是太陽。是真正的人。現今，女性是月亮。是靠他人而活，靠其他光芒而發光，臉色如病人般蒼白的月亮。」（《元始，女性乃太陽》）這是平塚雷鳥^①所寫評論的開篇，刊登在雜誌《青

^① 平塚雷鳥（一八八六—一九七一），日本近代著名的社會運動家。她創辦了雜誌《青鞥》，一生致力於女性解放和平運動。



圖 1-6 聚集在《青鞥》的女性們。右起第二人是平塚雷鳥。
(一九一二年)

鞥》(一九一二年九月)的創刊號上。她用與之前的擬古文不同的文體和形式宣揚了女性氣質。聚集在《青鞥》的女性們，開始批判舊制度和舊勢力。出版《青鞥》的青鞥社在《青鞥社大綱》第一條中規定了其目的，是謀求「女性文學的發展」，讓人「發揮天賦與各自的特點」，在未來孕育出「女天才」。第五條規定，只要是贊成這個目的的「女性文學者」和希望成為這種人物的「女子」，「不論人種」，均能入社。另外，關於「男子」，只要他贊同這個目的，「我們認可他是值得社員尊敬的人」，就能成為「客座」。二十世紀初，帝國的根本性變化，也觸動了女性的主體。

青鞥社的發起人是中野初子(東京)、保持研子(愛媛)、木內錠子(東京)、物集和子(東京)和平塚明子(雷鳥，東京)。除了物集和子，其他四人均畢業於日本女子大學。《青鞥》的執筆者約有一百五十人，據推測，其社員在九十至一百人之間。如果再加上贊助人，相關

人士的出生地涉及到二十三個府、縣。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不少，有著自我表達願望的女性們首先選擇了「文學」這一形式，從全國各地聚在了一起。

反抗良妻賢母

聚集在《青鞜》周圍的女性們一心批判的是「良妻賢母」思想。所謂的「良妻賢母」是一種近代社會規範，女性作為「妻子」被限制在私人領域的家庭裡，與此同時，她們作為「母親」生育將來的國民，通過這種奉獻行為，她們與國家（公）連接、統一起來。平塚雷鳥她們深刻的批判了良妻賢母思想，認為這一思想表面上承認女性作用，但它損害女性的主體，實際上創造出男女之間的不平等和不自由。

平塚雷鳥宣告「我是新女性」，對抗男性社會。她說，要「破壞」為男性的方便而制定的「舊道德、舊法律」（《新女性》，《中央公論》，一九一三年一月）。在隨之而來的二月，她在神田的基督教青年會館舉行「新女性」演講會，這是青鞜會第一次公開演講會，前來的聽眾有近千人。之前也有「新女性」這種說法。但是，雷鳥從女性立場出發，重新定義男性所說的「新女性」，把它變成一個批判性概念，從而讓它成為女性的宣言。這時，男性強烈反對，常見他們揶揄、中傷青鞜社的女性。

「個人」的實現

《青鞨》在四年六個月裡出版了五十二冊，上面登載了大量女性的文章。那些文章都各自主張自我，批判使自我疏遠的男性社會。荒木郁的《信》（《青鞨》，一九一二年四月）是一篇描寫婚外情的小說，追求在戀愛中實現自我（這期《青鞨》受到禁止發行處分。《青鞨》一共受到過三次這樣的處分）。岩野清子重視「個性」，致力於「發揮自我」。她不怕「新舊思想衝突」，「詛咒家庭」，「破壞舊道德」。而且，她標榜依靠「自我」、使「自我」充實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與家庭》，《青鞨》，一九一四年九月）。

《青鞨》上登載的作品，通過各種形式和文體，探討實現自我的方法，記下了關於家庭和生活的理念，討論戀愛、結婚、離婚等話題。不過，很多作品反覆坦白個人體驗，書寫內心，講述煩惱與愛慕之情。教師、打字員等職業的女性也在小說中登場。

她們的目標是實現「個人」，是擁有與男性不同的價值觀和活法。前面提到的《元始，女性乃太陽》中，平塚雷鳥說，她不忍心看到那種「女性」的樣子——她們羨慕男性、模仿男性、「在不久的將來會走上」與男性相同的道路。因此，她們拒絕結婚制度，批判家庭制度，卻重視戀愛。其結果是，她們找到了這樣一種姿態——把戀愛視為人的自然感情，把它與自我尊重問題放在一起，通過戀愛追求

「個人」。這不僅與社會、世間的「良俗」對立，它作為一種理念，追求的是一種與支撐近代的、男性化的「國民」不同的狀態。而且，她們不是通過與男性的關係來定位女性，而是探索女性自己的自立理論，主張以性關係為軸來建立自我。

《青鞈》就像這樣，以女性的性存在為出發點，從中探索各種關係，對基於性別的角色分擔表示懷疑。

「貞操」與「墮胎」

青鞈社於一九一三年九月修正了大綱，重心放在「女性文學」上，在此態度之上，還加上了「女性的覺醒」。從一九一四年十一月開始，主張「打破習俗」的伊藤野枝成為主編，《青鞈》開始出現變化。其中的一個例子就是，關於「貞操」、「墮胎」和「廢娼」的爭論以《青鞈》等為舞台展開。我們在這裡稍微多談一點關於「貞操」和「墮胎」的爭論吧。

「貞操」的論戰始於生田花世的《生存與貞操》（《反響》，一九一四年九月）。生田一邊自言自語似的「坦白」自己的體驗，一邊暗示，自己實踐「女性獨立」時，面對著「生存和貞操的事實」，即：把「貞操」作為生活手段。對此，安田泉月強烈反對生田。安田說，生田所言「是自我侮辱，完全不是覺醒女性的呼聲」。她語氣強硬的批判道，這是在埋葬「人」、「女性」和「自己」（《活著與貞操》，《青鞈》，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伊藤野枝也參加了這次的爭論（《關於貞操的雜感》，《青鞈》，一九一五年二月），她一邊批判生田，一邊說，我們應該把男性的「貞操」和女性一樣視為問題。

安田皐月寫了以因貧困「墮胎」的女性為主人公的故事（《獄中女致男人》，《青鞈》，一九一五年六月）。伊藤野枝針對這個創作，也提出了批判。伊藤在同一期的《青鞈》中，對安田把孕育「生命」的東西「墮胎」掉了一事提出質疑（《私信》，同上）。

針對伊藤野枝的發言，平塚雷鳥再次以個人的體驗為基礎，坦白了自己對「避孕」的猶豫，同時指出，這是「婦人作為『性』存在的生活——婦人對種族的天職」和「作為『個人』存在的婦人的自身生活」之間的矛盾衝突。在平塚看來，安田和伊藤都忽略了女性氣質，看起來只把問題縮小到「貧困，即生活困難」上了（《作為個人的生活和作為性的生活之間的鬥爭》，《青鞈》，一九一五年九月）。

朝鮮半島的女性在一九二〇年出版《新女子》。《青鞈》眾人的主張與她們呼應。這表明，二十世紀初的東亞女性們的活動中有共通的東西。不過，《青鞈》尚未觸及到「民族」，它還沒有作為帝國女性的問題被提上議事日程。

在這個過程中，《中央公論》的臨時增刊《婦人問題專刊》（一九一三年七月）出版了。《婦人公論》（一九一六年一月）和《主婦之友》（一九一七年二月）都創刊了。《主婦之友》的創刊號有一百二十頁，發行了一萬部。不但提及了經濟面，還追求家

庭生活的合理化，提供衣、食、住各方面的實際知識，促進女性作為「主婦」的主體化（第五章第二節）。

私事商談

當然，絕大多數女性還無法踏足這樣的事情。《讀賣新聞》從一九一四年四月三日新增《讀賣 婦人附錄》，用它鼓勵女性，把新家庭形象與「中產」合在一起呈現出來。其中，人們重視《婦人附錄》所開始的「私事商量」（一九一四年五月二日）。

我有婚約在身，但是，我曾在以前和別的男性接吻。（中略）接吻自古以來就像日本說的那樣，等於玷污了身體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想，我沒資格用這骯髒的身體和純潔的未婚夫結婚。因此，我打算一輩子獨身。這樣行嗎？（下園小百合，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八日）

這時，回答者說，只要不是「打心底同意」的接吻，就「絕對沒有玷污了身體」。回答者把接吻視為「心」的問題來解決，並沒有改變純潔的規範。相反，回答者還評價苦惱的寫信者的「少女之心」，強化了規範。

「私事商談」通過商談促進了女性的主體化。另外，閱讀這個欄目的女性會發現，被視為理所當然並且束縛了自己的現狀，作為規範，在寫信商談者和回答者的交流中呈現了出來。通過懷疑、議論，讀者將不再把這種自縛的機制視為理所當然了吧。

女性並不是僅僅處在這種動向中。一九〇一年二月，奧村五百子設立愛國婦人會。這個組織一開始的工作是接送出征日俄戰爭的部隊，慰問留守家人，慰問傷、病的士兵和遺屬等，參加戰死者和病死者的葬禮，贈送慰問袋，捐贈財物。在那之後，她們的活動仍在繼續。她們還在各地設立愛國婦人會支部，把地方上有名望的家族的女性集結起來，展開活動。日本為鎮壓朝鮮義兵運動出兵時，以及出兵西伯利亞時，她們都贈送慰問袋。草根階層的保守派也通過組織活動起來。作為一個國民輔助男性是女性的任務，這一潮流開始洶湧起來。

對「新女性」的支持

但是，漸漸的，人們越來越支持「新女性」。赤壁夕潮發表於《北陸時代》（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的《為了新女性》批判說，「新女性」登場時日已久，但社會上「無知、不理解、不自省、無益的嘲笑和迫害」仍然不斷。這篇評論對不理解和嘲笑「新女性」的行為表示

憤慨。而且，赤壁全面擁護「新女性」。赤壁寫道：「時勢讓她們極少數人覺醒了。少數覺醒的新女性，從幾百年來身為男性奴隸的惡劣遭遇中逃離出來，努力成為真實的人、真實的女性，同時促使大量的男、女性覺醒。何惡之有？」她還針對男性展開了批判，說那些喜歡只會做飯、養孩子的「泥娃娃」的男人，自己也是「泥娃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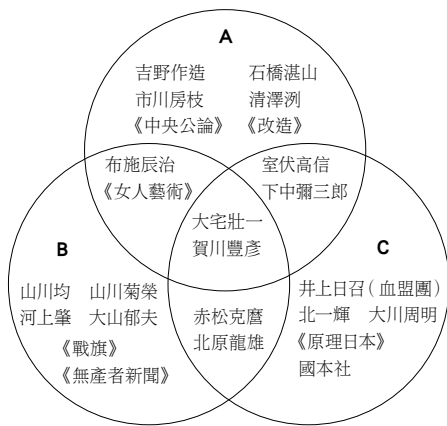
結語——「滿州事變」前後

三股潮流 鼎立與《女 人藝術》

以日俄戰爭後城市民眾的騷亂為契機，大正民主作為一種民本主義潮流興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和米騷動加快了它的發展，產生出了「改造」的社會風潮。雜業階層和老闊們、工人和農民，還有女性、被歧視部落和殖民地人，他們從自己的立場出發提出了各自的身份認同（identity），呼籲社會變革。而且，各階層的這種主張，還與「日本人」和「國民」的主張重合在一起。而且，這種動向還創造出了由普通選舉法和治安維持法組成的一九二五年體制。

如果我們單看關東大地震後的一九二〇年代後期的狀況，就會發現A民本主義、B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C國粹主義這三種主張鼎立（請參考下頁圖）。A是進一步追求「近代」，B和C是打敗和否定「近代」，這三者有對立、對抗關係，同時，它們還有A—B—C互相支持的局面。有的人物和團體位處於三者重合之處。

雜誌《女人藝術》因連載了林芙美子的《放浪記》而為人所知，它橫跨A—B領域。長谷川時雨於一九二八年七月創辦了《女人藝術》。它剛剛被創刊後就



一九二〇年代後半期的三股潮流

帶有激進色彩，例如：雜誌中展開了急進工會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論戰，介紹了蘇聯的事例。《女人藝術》自身認為，我們為「受到一切進步女性的支持」而喜悅（《請一定讀它》，一九三一年十月）。這樣的長谷川和《女人藝術》，與處於A位置的奧梅尾和《職業婦人》、市川房枝和《婦選》，以及處於B位置的高群逸枝和《婦人戰線》等人與雜誌呼應，成為了一九二〇年代後半期到一九三〇年代的轉型期狀況中的一個篇章，創造出了其潮流。

但是，在「滿州事變」之後，《女人藝術》登載了座談會「新滿州國是甚麼樣的地方」（一九三二年二月），顯示出的態度是要加入協助和統合的潮流中，這股潮流以滿州事變為契機形成。然後，它於一九三二年六月突然停刊。它一直存在內部對立的問題，但是，其決定性的誘因是滿州事變的爆發。

滿州事變 的衝擊

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發生了滿州事變。中國奉天郊外柳條湖的鐵路被炸毀，日本稱這是中國軍隊幹的，並以此為藉口出兵。滿州事變促進了大正民主的轉變。關於滿州事變前的經過和之後的發展，將由叢書第五冊探討。

滿州事變一方面使得日本社會中的對立尖銳化，另一方面它製造出的論調卻消解和消除掉了對立和對抗的存在。「全日本洋溢著沸騰的愛國血」是《東京朝日新聞》（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標題。這期報紙接下來煽情道：「在暴風雪的原野，炮彈下的壕溝，我們的派遣軍將士死守祖國生命線，國民對他們的感激日益強烈。」它還報道，慰問金日均一千五百日元到一千六百日元，慰問袋平均達三萬個。滿州事變後，人們的感情就這樣一下子變成全國性的。到當時為止的批判性言論都收起了矛頭。圖中那種三股潮流鼎立的狀況，急速改變。

其中的一個變化是，緊挨著B領域的社會運動變樣了。一九三二年三月，東京地鐵勞資糾紛因為參與者提出女性「有薪生理假期一週」而受到關注，同時，參與者還提出保證出征者的工資。總同盟號召「救援出征者的運動，此運動的中心是保證出征者以及應召者的全額日薪」（一九三二年三月）。這段時期，為爭取應召者的日薪，發生了不少勞資爭議（《東京朝日新聞》，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位於A的吉野作造對滿州事變有何反應？吉野的論文《民族和階級和戰爭》（《中央公論》，一九三二年一月）中，空字頗多。他在裡面說，「不得不說」這次的「×××××（軍事行動）」的本質是「×××××××××（帝國主義性質的）」，呼籲有必要通過這種自覺「重新審視帝國主義」。同時，對於新聞論調「一律」傾向於「謳歌出兵」，而無產政黨又不進行「自由開朗的批判」，吉野呈上了忠告。

情況正是如此。柳條湖事件剛發生，社會民眾黨就派遣了現場視察團。儘管他們在十一月時內部有爭議，但他們仍然發表了支持軍部的《關於滿蒙問題的指令》。指令認為「支那軍閥」侵害「滿蒙」的權益是「不對」的，提倡「確保日本國民大眾的生存權」。還有一個政黨是全國勞農大眾黨（請參照圖C-3），它表明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設立了反對對支出兵鬥爭委員會。但是，黨內的國會議員中有人同意出兵，因此黨大會沒能做出反對出兵的決定。

無產政黨如此情況，其他政黨顯得更加錯綜複雜。民政黨內部出現了接近軍部的人。安達謙藏內相和中野正剛等人，與陸軍革新派的熊本第六師團長荒木貞夫接近。更進一步的是，他們還把政友會的一部分人捲進來，策動「聯合內閣」（安達等人後來脫離民政黨，成立了國民同盟）。

大正民主 和戰時動 員之間

在此過程中，民政黨的若槻禮次郎內閣（第二次）接替了濱口雄幸內閣，應對「滿州事變」。但是，內閣沒能徹底處理現場軍人的冒進，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總辭職。犬養毅內閣在十二月十三日成立，成為戰前最後一個政黨內閣。

《東京朝日新聞》（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說，「政黨政治時日尚淺，還沒有成為政治規則。然而，它已讓國民厭倦，還進一步成為被厭惡的對象，其原因第一是腐敗，第二是無能」，而且，最近的政治局面，因滿州事變和財界大震蕩而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與此同時，認為政治不可靠的頑固思想更加頑固」。滿州事變引發的事態導致社會運動和政黨政治雙方都出現變化和批判，大正民主走向「結束」。

濱口首相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受到槍擊後，井上日召的血盟團員射殺了前藏相井上準之助（一九三二年二月九日），三井的合名理事長團琢磨也被射殺（三月五日）。這樣的恐怖事件接二連三。這意味著代替言論的直接行動出現了，它給人民民主已逝的印象。

但是，重要的一點是，大正民主的結束也是在其內部邏輯控制範圍內發生的事。例如廢娼運動，它促使「妓女」自由停業，批判由國家管理的公娼制度。這項運動有較長歷史，擔負起大正民主的一角。其核心力量日本基督教婦人矯風會

（一八九三年）和廓清會（一九一一年），在一九二六年六月成立廓清會婦人矯風會連合（翌年改為廓清會婦人矯風會廢娼連盟）。在已經實施廢娼的群馬縣，以及秋田、福島、福井等七個縣內，廢娼建議都被採納，它們變成了廢娼縣。但是，運動自始至終都有的一個理論是，要與帝國保持先天的一致，例如，「妓女」「玷污日本的體面」，「不利於健全國家快速發展」（「滿州婦人救濟會」的設立宗旨，一九〇六年）。然後，一九三五年時，此運動把廢娼同盟向「國民純潔同盟」方向改組。

市川房枝等人把「廢娼運動」稱為婦選運動的「別動隊」。她們以東京市會的議員選舉為契機，在一九三三年三月成立了東京婦人市政淨化連盟，忙於批判賄賂事件、垃圾處理問題等，通過展示女性的力量來要求公民權。淨化連盟謀求加入一九二五年體制，通過主體性的動員來協助體制。但是，因為這項運動追求的是與體制一致，還批判政黨，其結果是破壞了現有政黨的基礎。這種動向，在一九三五、三六年時，在國家政治的層面上，發展成由官員主導的選舉整飭運動。

一九三〇年代兼具「儘管是大正民主」和「正因為是大正民主」兩個特點。具體說來，前者是指無法維持成果的局面，後者是指運動邏輯在實際中變成了統合和妥協。與此同時，戰時動員時代開始了。也許可以這樣說，二十世紀開頭的四分之一世紀的經驗，充分表明了帝國民主的可能性和困難。

後記

從二十世紀初的當下來看，大正民主開始於差不多一百年前。一九七〇年初，我開始學習大正民主和那個時代的歷史。時光飛逝，那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本科論文調查了友愛會的情況，研究生課中，我參加了《原敬日記》講讀課的課堂討論。

從研究史的觀點看，那個時期在大正民主研究史上是劃時代的時期。具體情況讀者可以從書末的參考文獻看到。一九七〇年代，松尾尊兌的《大正民主》（一九七四年）等著作有力的開拓了這個領域。從政治史研究、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出發的有趣研究成果不斷被推出，大正民主的研究呈現出活力。

那時正好是需要重新追問民主是甚麼的時期。學生運動、市民運動和居民運動活躍起來，同時，圍繞著這些運動的各種障礙和困難也顯露出來了。那個時期的大正民主研究要做的事，是從二十世紀的歷史中，找出民主主義的多種存在形式，深入考察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和聯繫。

自那之後，我的關心漸漸遠離大正民主研究。但是，在二十一世紀初，人們

渴望民主。此種情況下，我重新回到大正民主研究。

近年的研究變化如下。研究者深入各種論點；同這個期間的歷史學關心呼應，與社會性別和民族性相關的討論也被深化；研究者詳細論述各帝國之間的各種關係、殖民地動向。與此同時，研究者討論「國民」與「民族」之間的相克，研究焦點放在民主內在的民族主義上。我們要重新建構和敘述大正民主的歷史情況的話，必須要跨越不同層面上的障礙。

有的地方應該從「通史」的觀點來敘述，關於這一點，我想試著重新立論。本書執筆之際，編輯部的小田野耕明竭盡全力幫助我。我能寫成本書，全仰仗小田野先生的鼓勵，深表謝意。

成田龍一

二〇〇七年初春